

湖北省党史学会论文选辑

(1979—1980)

湖北省党史学会编

1981年6月

编者说明

一、湖北省党史学会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的两年间，举行了三次学术讨论会：“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一九七九年学术讨论会，一九八〇年学术讨论会。我省广大党史工作者，经过辛勤努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交和宣读了许多学术论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不少论文已在报刊公开发表。

二、我们现将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除公开发表者外，编选了这个文集。由于时间紧迫，所有论文，都未经作者修改订正，仅供内部参考。

三、三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已经公开发表的，连同我会会员两年来另外发表的有关党史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我们只将篇名汇集刊出，并注明作者姓名、报刊日期、期数，供查阅。

湖北省党史学会

年会论文编辑组

一九八〇年六月

40259
3195

目 录

纪念五四运动缅怀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李大钊同志·····	马定中	(1)
李大钊同志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业绩永垂青史·····	杨存厚	(8)
陈独秀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转变·····	罗天乾	(12)
《湘江评论》与毛泽东同志的早期思想·····	沈 骏	(23)
五四时期的陈潭秋——陈潭秋同志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陈乃宣 胡云秋 刘友焕 刘跃光 张安庆	(30)
恽代英早期思想与无政府主义·····	田子渝 李良明	(37)
恽代英同志在“五四”时期的革命活动·····	廖鑫初	(46)
略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影响·····	沈 骏	(57)
论五四时期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认识的飞跃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蔡德祐 付荷生	(69)
五四运动在武汉·····	张影辉 孔祥征 虞崇胜	(76)
五四与妇女解放运动·····	邱 馨	(89)
党的第一个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熊崇善	(95)
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屠忠林 胡传章 张宣源	(98)
一九二〇——一九二七年湖北的党组织概况·····	屠忠林 胡传章 张宣源	(106)
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刘其发 钱 枫	(110)
对如何评价陈独秀起草的《农民运动问题议决案》的 几点看法·····	黄学佶	(123)
北伐前后的冯玉祥·····	邹孟贤	(129)
关于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的评价问题·····	毛 磊	(138)
试论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迁都之争·····	曾宪林	(148)

关于收回汉口英租界若干问题的探讨·····	倪忠文(154)
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个历史教训·····	刘继增(162)
湖北人民反击夏斗寅叛变的斗争·····	张光宇(173)
大革命后期汪精卫反动集团是怎样出卖革命的·····	吴德华(180)
武汉国民政府大事记(初稿)·····	曾宪林(190)
不倦的战士沈泽民·····	武汉工学院党史教学组(231)
周恩来同志反对立三路线的重大步骤	
——学习《关于武汉工作问题》一文·····	陈乃宣(239)
评国民党改组派·····	吴德华(244)
党的土地政策在湘鄂西苏区的实施和变化·····	古堡(254)
学习周恩来同志论抗日持久战的光辉思想·····	邱馨 高世纲(260)
皖南事变初探	
——写在皖南事变发生四十周年·····	蔡德祐 付荷生 杨存厚(267)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陈隐若(276)
解放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	马维骆 杨世松(289)
	林拔道
回忆解放战争的华北学联·····	孙清标 柯在铄(301)
关于我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的几个问题·····	宋镜明(323)
略谈我国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晋宏忠(335)
我国建国初期三年的社会性质·····	高世纲 刘泽洪(341)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	空军雷达学校政治教研室党史组整理(347)
关于农业合作化几个问题的探讨·····	杨秀梅 徐达(367)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经验教训·····	严梅君(373)
重新评价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	贾苏(380)
刘少奇在贯彻党的八字方针中的贡献·····	樊蕴珍 刘朝军(386)
附 录·····	(397)

纪念“五四”运动，缅怀无产阶级 革命的先驱李大钊同志

湖北财经学院 马定中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群众爱国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李大钊同志在“五四”运动时期，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代表着运动的正确方向，给予运动以深刻地影响和有力地推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钊同志的光辉业绩，决心继承先驱者所开创的事业，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

(一)

1918年夏天以前，大钊同志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无论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都走在运动的前面，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到来。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政权落到了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手里。这个大野心家阴谋家，对内依靠顽固守旧的封建势力，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为了当上皇帝，他不惜将大量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出卖给帝国主义，把中国拖向了绝境。

在国家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揭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任务，即民主与科学。他说：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把这两个任务比作车的两轮，相辅而行，缺一不可。他认为只有完成这两大任务，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者们就以《新青年》为基本阵地，向着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青年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迅速唤起了青年的觉醒。

大钊同志从1913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活动。1916年夏天从日本回国后，立即参加了《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并于1918年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在这段时间里大钊同志写了大量文章，宣传民主反对专制，宣传科学反对迷信，宣传进步反对倒退，宣传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反对消极保守的悲观主义。大钊同志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坚决，虽然他的思想还超不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但同当时的一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们相比，大钊同志是出类拔萃的。

在政治上，大钊同志较早地对资产阶级共和及资产阶级政党表示了怀疑和失望，并且积极地探索新的道路。早在1913年间，他就针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袁世凯窃取政权后的丑恶表演，在《大哀篇》中，揭露了当时的所谓共和国徒有其表，民主完全是欺骗。他

指出民主、民权、幸福，皆被“少数豪暴狡狴者”所窃取，所掠夺，政权实质上仍是封建专制，广大人民仍然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据此，他发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的哀叹。谈到当时的政党，他认为共和国的所有政党，都是些乌合之众，它们或自诩稳健，或自夸急进，或自矜折衷，“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狴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讲到这些政党的作用，他指出“但见吾国今日之所谓政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他认为无论这些政党中那一个上台执政，则“吾国必亡”，表示了深恶痛绝。可是，直到“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还主张由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大钊同志思想的先进。大钊同志站在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立场上，以人民是否真正享受了民主权力和幸福为尺度，自然会对资产阶级的两党政治连同它的共和形式在中国是否能够行得通，产生怀疑和失望。过了不久，大钊同志就在《青春》一文中，提出要“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创造一个青春的国家”。

大钊同志始终把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同反对封建军阀的现实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着新文化运动朝着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方向前进。封建主义的旧政权，是封建主义旧文化保护者，只有彻底摧毁旧政权，才能彻底摧毁旧文化。显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者们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时，往往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然而触及现实政治斗争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者回避，或者轻描淡写，或者折衷调和，陷入改良主义。就连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在谈到它的宗旨时，也竟然声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至于胡适之流，更是假惺惺地发誓赌咒说他决心廿年不谈政治。大钊同志却自始至终把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同反对军阀的现实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时刻关注着现实政治的动向，及时地揭露封建军阀、官僚、政客们犯下的种种罪行，无情地抨击封建专制的黑暗，唤起人民对他们的仇恨，引导人民起来同他们作斗争。在《现在与将来》一文中，大钊同志揭露说：“试看那强盗军阀，那个不是忙着收割地皮，扣侵军饷，拿到他家，盖上比城墙还坚的房子，预备他那子孙下辈之业？那卖国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那最时髦的政客，成日价营营苟苟，忙个不了，今天靠着某军阀，明天靠着某元老，也总想作回大官、发回大财。”他的许多文章，都是揭露、声讨封建军阀、官僚、政客和帝国主义的檄文。

大钊同志对于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一个从政治上奴役人民，一个从思想上奴役人民，二者交相为用，狼狈为奸。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学以造乡愿，政以畜大盗，大盗与乡愿交为狼狈，深为盘结，而民命不堪矣。”在《乡愿与大盗》一文中进一步说：“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相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当封建军阀将孔教列入宪法的时候，大钊同志立即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之道入于宪法，“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由于大钊同志始终把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和反对军阀的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能够将青年的视线从书斋引向现实的政治斗争，唤起他们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引导他们去为彻底反对封建主义而斗争。

大钊同志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和民族革命的观点，推动着新文化运动朝着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向前进。他自幼就目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对帝国主义怀有刻骨仇

恨。早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的活动。当袁世凯同日本签订廿一条卖国条约的时候，大钊同志立即写了《国民之薪胆》加以揭露，随即又代表留日学生总会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散发到全国各地。这两篇文章，痛斥了卖国贼袁世凯丧权辱国，深刻地揭露了廿一条的侵略实质，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坚决反对，大钊同志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彻底。他既不害怕威吓，又不相信欺骗，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常常以武力相威胁，许多人常常畏惧退缩，帝国主义则得寸进尺，步步相逼。大钊同志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针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吓说：“彼有强暴之陆军，我有牺牲之血肉，彼有坚巨之战舰，我有朝野之决心……举四百余州之山河，四万万人之坟墓，日本虽横，对此血战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经验证明，在帝国主义面前，只有抱定这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才能挫败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

帝国主义除了武装侵略之外，也常常是欺骗的好手。直到“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者中还有许多人帝国主义的的面目认识不清，他们或者幻想依靠某些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些帝国主义；或者幻想依靠帝国主义来反对国内的封建军阀。大钊同志较早地破除了这种幻想。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他针对当时许多人对帝国主义存有浓厚的幻想问道：“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和平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决议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和平、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大强盗国家的牺牲！”他痛斥反动统治阶级历来的对外信条“以夷治夷”是根本的大错，他说：“不知道有几多耻辱、哀痛、失败、伤心的陈迹”，在这句话里包藏。他认为“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他强调指出，我们要有自立的觉悟，有自觉的胆子，坚信中华民族有自立的能力，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反对帝国主义与民族自决、民族解放的问题联系起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经验表明，不破除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就不会有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不可能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大钊同志具有坚定的反帝斗争的立场和决心，因而他能够在斗争中较早的破除了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他的这种认识，对于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极其重要的。

(二)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大钊同志满怀喜悦的心情，最先向中国人民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人民指出了真正的出路，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给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以决定性的影响。与此同时，大钊同志也由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由一个民主革命家转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由于大钊同志长期以来坚定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上，不断地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不倦地为救国救民找寻出路，所以，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大钊同志便最先看清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意义，坚信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热烈欢呼人

类历史新纪元的到来。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时，受到了中外反动派的种种歪曲和诬蔑，使许多人产生误解，引起忧虑和悲观。1918年7月，大钊同志写了《法俄革命比较观》一文，驱散了反动派散布的迷雾，使人们看到十月革命的真象。文章正确阐明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俄罗斯革命是廿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是社会的革命并著世界革命的色彩者也。”文章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极深刻的革命，它免不了要使用暴力破坏一切旧的东西，“将从来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并且总结了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不彻底破坏旧的秩序新的秩序就不能建立；没有最大的牺牲，就不能换得最大的成功，这是合乎历史规律的。他举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来作证明。文章最后阐明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引导人们来正确对待这个革命，指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迓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迓其适于自由、人道之上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不要被一时的变乱现象所蒙蔽而对十月革命悲观失望。大钊同志的这篇文章，对于驳斥反动派的恶意宣传，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十月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1918年11月11日，战败国德奥等“同盟国”签字投降。美英法等战胜国则大张旗鼓，庆祝胜利。北京城里也举行游行、提灯、阅兵，欢呼胜利。大钊同志于11月15日，接连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正确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性质，回答了胜利究竟是属于谁的问题，阐明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指出了中国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文章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互相争夺的战争。这次战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不是那一国的军阀资本家的胜利，而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文章指出，美英等联合国，发狂庆祝胜利，全没意义，“就是他们的政治命运，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文章谈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廿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并且强调了这个革命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指出廿世纪的革命，是世界的群众运动，“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中间，历史上残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碍这新运动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文章以坚定的信念宣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元旦，大钊同志写了《新纪元》的文章，来庆祝这新的一年。这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更明确地指出中国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文章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这里所说的新人生的道路，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1919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的民主运动。运动迅速普及到全国，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大钊同志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指导者，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进行坚决斗争，引导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发展。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大钊同志最先起来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大

钊同志为《新青年》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大钊同志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他指出，这三个部分有不可分的关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学说具有重要的地位，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准确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中心，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运动中，大钊同志还在《晨报付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进步青年争相阅读的材料，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19年7月，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胡适抛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妄图把青年引上改良主义的邪路。大钊同志立即挺身而出，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而斗争，他于8月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严厉地驳斥了胡适的反动谬论，沉重地打击了胡适的改良主义。大钊同志指出，过激主义一辞，是反动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污蔑，这种伎俩并不新鲜，是继承了几千年前“先圣先贤”的破旧衣钵，那“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就是他们的逻辑，就是他们的经典。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设如他们想不出过激主义这个名词，还会随便想出其他吓人的大帽子，如“邪说异端”，“洪水猛兽”等等，拿来给人戴上。在反动派和反动当局一致竭力攻击“过激主义”和“过激党”的恐怖气氛中，大钊同志大义凛然地公开宣布：“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深刻地批判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谬论，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能分离的。他说：“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举出俄国为例，说明只有进行彻底革命，才能解决一个一个的社会问题，从而批判了胡适那种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谬论，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除一大障碍。

在大钊同志的推动下，“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一个波澜壮阔的马列主义的思想运动。

(三)

“五四”运动以后，大钊同志一方面继续从事理论活动，努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积极参加实际斗争，从事工人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这两方面的活动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钊同志的最大贡献是他一开始就向中国人民传播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使中国革命能够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无情地宣布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大钊同志长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学习，摸索，寻找出路，忽然遇到推翻帝国主义的十月革命，自然喜出望外，因而能够立即从这个伟大的革命实践中，辨认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各国党虽然居于多数，却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修正主义政党。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就看出了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实质：“专取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变动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斗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原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这实

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深刻地揭露了第二国际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要害。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大钊同志对第二国际各国党进行了深刻的阶级分析，揭露了他们的阶级实质，明确地宣布：“简明的说，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由于大钊同志一开始就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决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这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大钊同志的另一个大贡献是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为我们树立了优良的学风，这就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大钊同志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报纸编辑和大学教授。但是他丝毫没有空谈习气，学习马克思主义，目的性很明确，完全是为着中国的革命。他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即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中，他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并恳切地说，“倘若中国将来能够产生几位真正了解马克思的学说，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的最大希望。”“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这是我最盼望的。”这种见解和毛泽东同志后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选集》773页）是完全一致的。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大钊同志驳斥了胡适将问题与主义截然分离开来的谬论，强调了理论与实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并且还进一步论述了必须按照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应用理论，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理论，他说：“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又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大钊同志不仅宣传理论与实际应当相结合，而且在行动上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方面扎扎实实地研究实际问题，如劳工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学生问题，农村问题，等等，努力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

大钊同志的又一个贡献，是他最早提出了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农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推动了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大钊同志从十月革命中进一步认识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依靠工农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彻底改造社会，彻底改造世界的思想。“五四”运动前夕，大钊同志开始注意研究劳工问题，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提出了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他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认为民众势力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应当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他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同农民一起向黑暗势力作斗争。他阐明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1920年3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

开始进行工人运动。1920年5月1日，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五一” May Day 运动史》，同时也是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从事工人运动写的宣讲材料。大钊同志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五一”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用各国工人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并且取得胜利的历史，来唤起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提出要使“五一劳动节”由三五文人的运动和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成工人阶级在街头上的群众阶级斗争。如何实现这个转变呢？这就必须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大钊同志实现了这个任务。在他的组织领导下，1921年五月一日，长辛店工人一千多人举行了空前的示威游行，并随即建立了工人自己的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工会）。此后，“五一”劳动节真正成了全国工人阶级的示威运动。

大钊同志提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引导大批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也是大钊同志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的重大贡献之一。

大钊同志热爱真理，追求进步，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高贵品质，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学习的光辉榜样。大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他平生热爱真理，在《真理与权威》一文中，他说：“人生的最高理想，在求达于真理”。“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逆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为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他能够勇敢地抛弃旧的，能够不断地修正错误。大钊同志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就是一个勇敢地抛弃旧思想，不断地改造思想和世界观的过程。大钊同志在为真理而斗争中，坚信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对于共产主义事业抱有必胜的信心。他认为监狱，刑罚，苦痛，穷困，死杀，在真理面前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在《牺牲》一文中他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大钊同志忠实地实践了这美好的誓言。1927年4月6日，反动军阀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身系囹圄，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主义的高贵气节和操守。4月28日，大钊同志遭到杀害。临刑前，他庄严宣告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从容就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大钊同志壮烈牺牲已经五十二年了，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胜利。然而今天的胜利，离我们奋斗的目标相距还很远。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今后的新长征途中，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从前没有遇到的新问题，还会有许多的艰难险阻，这就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大钊同志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为了解决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而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认真研究新情况，努力解决新问题，使马列主义在现代化建设中放出更大的光彩，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奋斗。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论文）

李大钊同志创建中国共产党 的业绩永垂青史

湖北财经学院 杨存厚

大钊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他最早宣传十月革命、最先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初撰写《五一运动史》。他的宣传及其活动，促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一)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奋斗牺牲，前赴后继，寻找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革命真理。但是直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我国的先进人物，才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当中国人民在沉沉黑夜中看到十月革命的曙光时，心花为之怒放，带来了新的希望。毛泽东同志满腔热情地歌颂它是寰瀛九万里，欧亚满天红。周恩来同志称赞它是一线阳光穿云出。李大钊同志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在1918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政治论文，对于十月革命的性质、胜利原因、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等作了深刻的论述。大钊同志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李大钊选集》第102页，以下引自本书的文字，均只注页码）那么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如何取得的呢？大钊同志认为是：马克思的功业、列宁的功业，是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大钊同志高度评价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111页）热烈欢呼人类新纪元的开始，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第117页）并号召中国人民应该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大钊同志的上述名著代表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和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它是我国最早宣传十月革命的光辉文献。

随着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人民的觉醒，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我国外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起了积极的领导和组织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周恩来同志在天津，恽代英同志在湖北，邓中夏同志在北京，都亲自组织和领导那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它的巨大革命力量，这对于这次运动的胜利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大钊同志，不仅和学生教师并肩战斗，参与成立教职员联合会，营救被捕学生，动员一些优秀青年到各地去点燃革命烈火；并且还大造革命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的檄文，大声疾呼：“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政府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耻辱，这

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第213页）该文最后提出：“我们的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第214页）号召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坚决斗争。大钊同志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于五月出版了“马克思研究号”，刊载论文八篇，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亲自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大钊同志在该文的序言中，明确宣布本文写作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第173页）。接着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反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第177页）这篇长文，是我国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文献，为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输送了新的血液，唤醒了广大进步青年去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这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了启蒙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多。反动统治者惊惶失措，加紧了对它的限制和围攻。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胡适密切配合跳出来公开反对马列主义的传播。1919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评论，叫嚷“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什么用处的”漫骂谈主义的人“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鹦鹉和留声机做的”面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同志挺身而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立即于同年八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旗帜鲜明指出：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的关系，要解决问题必须谈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第233页）这个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主义就是马列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主义。这次“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国最早的一场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大论战。它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扩大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接着大钊同志又写了许多政治论文，传播马列主义，并参与了批判梁启超、张东荪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李大钊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情宣传马列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五四运动开始了这两者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我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虽然已经有了初步工人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也参加过政治活动，但还是在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影响下进行的。工业无产阶级虽然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但是工人运动本身并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建立起本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才能使它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才能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工联主义的束缚，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大道。因此，如何使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创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时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则是这两者结合的典范。大钊同志把马列主义的宣传同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作了积极的贡献。

首先，他倡导知识分子必须与劳工相结合，积极努力把革命的思想灌输到工农中去。大钊同志指出：“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希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第146页）五四运动时，他一再鼓动青年学生到工人中去，并希望“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加入劳工运动，把那“精神改造

的种子”撒播到“深厚的土坵”中去，让它“发育起来”（第237页），开花结果。大钊同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一再阐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真理。他指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第340页）。这是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有力批判，给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积极投身于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其次，他撰写工人通俗读物热情宣传马列主义。1919年5月1日，北京《晨报》付刊在大钊同志直接帮助下，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了大钊同志写的《五一杂感》一文，扼要介绍了五一节由来后写道：“五月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是马克思的誕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人物”（171页）。这是中国报纸上第一次纪念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特别是把纪念红五月同纪念马克思的诞辰结合起来，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到了1920年五一节时，我国不少城市举行了庆祝活动，许多报纸也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大钊同志在《新青年》发表了《五一运动史》，该文详细介绍了各国工人阶级纪念“五一”节的斗争历史，赞扬了它们的英勇斗争精神；歌颂了为劳工阶级利益而牺牲的“马克思派的学者”；鼓励中国工人“起！起！！起！！勤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觉醒的日子了！”（第325页）并希望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同不共戴天的仇敌作斗争。这篇文章当时曾在我国许多报刊上全文转载，北京大学的革命青年还把它印成单行本，作为指导中国工人运动的丛书之一。大钊同志还于同年亲自主持召开了北京大学的“五一”节大会。这些活动推动了劳工运动的胜利进行。

再次，大钊同志特别重视工人的组织工作，号召建立工人团体。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所写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就鼓励工人组织起来，反对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指出：“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工人组织的团体。”“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第153页）之后，他和邓中夏等同志到京汉铁路长辛店亲自培育那里的工人组织。因而1921年“五一”节时，长辛店工人就举行了纪念大会，通过了成立工会的决议，工人们在会后游行示威。打着“工会成立”等旗帜。“五一”过后即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对于北方以至全国的工人运动都有很大影响，许多地方的工人代表都曾前来学习，回去后成立工人俱乐部。从此，“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组织程度日益加强，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有了牢固的阶级基础。

（三）

李大钊同志在宣传马列主义、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1918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兼经济学教授后，主持购买了二万余册外文书籍，其中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利用大学的课堂、报告会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教育和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0年3月，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起初会员虽然都是北大学生，但他们大多数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活跃人物，有的是学生会的干部，又是来自河北、山西、湖北、湖南、广西、浙江、云南等省籍的进步青年。因此，当它的启事、通告、发

起人在北京大学日刊登载后，于是会员大增，北京、山东等省的一些青年，长辛店、唐山地区的少数工人，也先后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研究方法：搜集马克思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每星期开一次讨论会，先由会员一人述释该题之内容及其要点，然后付之讨论；每月开一次讲演会，敦请名人学者担任讲演员；分组进行“特别研究”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等等；编译、刊印马克思著作和其他有关论文。当时曾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日记》等十余种，还出版了《非宗教论文集》等。大钊同志擅长英、日两国文字，对青年们在学习、翻译工作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辅导解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他有时在自己的办公室、住宅，或者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办公室（当时称“亢慕义斋”）与会员们亲切交谈，议论国内外大事及解决的办法，商讨如何到工人中去的问题，并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警句，教育会员要不畏一切艰难险阻去学习、宣传、捍卫马列主义，以自我牺牲的精神献身于中国的解放事业，从而引导了一批青年走向了革命道路，为北方的建党建团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首先在北京访问了大钊同志。接着由大钊同志邀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几位成员与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起开了座谈会，彼此介绍了两国的简情，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大钊同志在会上的简明致词，感谢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并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栽培，定会有收获的。当共产国际代表在北京工作告一段落后，大钊同志亲自写信，介绍他到上海去找陈独秀。1920年5月，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由上海小组发起，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等城市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9月，大钊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即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会议决定小组由大钊同志负责全面工作，其他同志分担组织、宣传、职工运动等方面的工作。至于经费问题，大钊同志当众宣布愿意从个人的薪俸中捐款解决。会后又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3月，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正式公开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会者有的是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有的是刚吸收入团的进步青年，以北大学生为最多。在签名簿上签到的有55人。当时反动统治机关派了一个暗探混进会场，把签到名单抄走，于是北京军警机关正式行文北京大学交出首犯李大钊等查明究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乃派代表向北大当局交涉，申请主持正义，勿受外界暴力干涉，维持学府尊严。学校对外分别解释，才含糊了结。

大钊同志呕心沥血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所培育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大社会主义青年团等革命组织，不仅为北方的建党作了巨大贡献，而且对全国其他地方的建党也有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大钊同志从思想上、干部上、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他的业绩永垂青史。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坚持马列主义原则，无限忠诚党的事业，为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论文）

陈独秀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转变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 罗天乾

究竟怎样认识在五四前后和建党时期的陈独秀？在这个时期，他的思想究竟有没有转变？如果说有转变究竟转变得怎样？这是我们党史工作者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应当弄清楚的问题。

我们认为不应该因为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后来叛变被清除出党，就把他叛变前特别是在五四前后和建党的贡献全盘否定。这样做显然违背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林彪、“四人帮”恰恰就是这样干的，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唯心主义横行和形而上学猖獗的丑恶咀脸。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实事求是。我们认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五四后，在1920年夏秋之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党的创建人之一。

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中国的大好河山，听人宰割，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满清皇帝，但是并没有推翻封建主义制度，袁世凯窃国，民族危机更加深重。

陈独秀和其他先进分子一样，深感“国势陵夷”。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1914年，他从日本回国后，正逢袁世凯恢复帝制，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专制制度宣战。陈独秀在《敬告青年》这篇发刊词中，对民主和科学作了阐述，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离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应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独秀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而强盛起来，就必须重视科学与人权（即民主），他把科学和民主比做车子的两轮，缺一不可。1917年夏，他又说：“愚固迷信共和，以为政治之极则，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所谓二大鸿宝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其革命和上升时期基本的东西，也是陈独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基本的东西。

陈独秀为什么那样崇拜科学和民主呢？他认为民主和科学救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忙，“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导光明世界。”因而他也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因此，陈独秀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势，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任务。陈独秀说“要拥护德莫克拉西（即民主）就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因斯（即科学）就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由此可见，陈独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内

容是广泛的，那种认为陈独秀所倡导的科学仅是自然科学显然是不全面的。

为了实现民主和科学的要求，他还提出：“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毫无疑问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要求，其目的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

陈独秀所拥护的德先生，就其内容和形式来说都是资产阶级的，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是以人权平等为宗旨，“拿英美做榜样”的共和政治。陈独秀认为这样的共和才是“真共和”，除此而外，都是伪共和。所谓真共和就是“唯民主义”，也就是所谓“主权在民”，“人民为主人”；所谓伪共和就是“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陈独秀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一文痛斥这种伪共和丧权辱国，大借外债，听人宰割，谋复帝制，废弃国会，任意苛敛，空言礼教，不尊重科学，等等。他揭露这种所谓共和实际是挂着中华民国的假招牌，“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陈独秀把帝国的军人、官僚和政客看做是中国的“三害”，说他们并没有好歹之分，都是一路货色，都是明抢暗夺，误国殃民”。他大声疾呼，要冲出“三害”的重围，另造一种新世界，“这种新世界的指针，就是唤起老百姓，都提起脚来同走‘实行民治’这一条道路”。

必须指出，陈独秀在那时没有认识到也不可能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资产阶级有民主，无产阶级没有民主，只有少数人有民主，多数人没有民主。资本统治一切。因此，不可能“主权在民”，也不可能“以人民为主人”，这是第一，第二，由于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异常软弱，因而不可能建立英美式的共和政治。

孔教是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是它的思想武器，是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与民主政治根本不相容。因此陈独秀猛烈抨击孔教，认为“孔教与帝制”，“尊孔与复辟”，“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照孔圣人的伦理学说，政治学说，都非立君不可”，“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可见，共和与孔教是“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独尊一孔，定孔教为国教，阻止思想信仰自由，闭塞人智，为祸甚烈。陈独秀认为几千年前的孔教“本失灵之偶像”，“吾华民族堕落的根源”，“不适应现代生活之需要，无尊崇之价值”。他说二十世纪的人应取二十世纪的文化思想，学说之兴废，随社会生活变化而变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承认社会生活变化，文化思想，道德伦理亦随之变化，承认社会发展变化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因此，他认为不合潮流的孔教“必当废弃”，“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应有之孔庙而罢其祀！”陈独秀的这些主张对于新文化运动，对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由于此，陈独秀遭到了孔教卫道士的辱骂和攻击，什么诋毁先圣，蔑弃儒书，自由恋爱，寡妇再嫁，剪辫子，等等，是什么“纪纲扫地”，“令人发指”，是什么“荡妇行为”，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为日月之经天，江河之纬地”，废弃孔教，就会“人将相食”，这是多么吓人。他们还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孔老二的思想体系，君臣父子三纲五常那些旧道德旧伦理不允许有丝毫改变，如果有所改变就会灾难临头。可见倡民主，反孔教是一场新与旧的激烈斗争。事实告诉人们反专制必反孔，反孔必反专制。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打倒孔家店”就是反封建主义的重要内容。林彪、“四人帮”硬说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是“尊孔派”，岂